

劉宏 黃堅立 主編

大視野 海外華人研究的 與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王賡武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致力中國史、海外華人史研究數十年，造詣極深，著作頗豐。

編者簡介

劉宏，歷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中文系，從事有關海外華人問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被聘為北京大學客座研究員及廈門大學客座教授。著作包括《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和以英、中、荷文在歐美、中港台、日本以及東南亞發表的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黃堅立，歷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也是該大學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的研究員。教學與研究範圍是中國近代現代史和新加坡戰後的商界與知識分子。著作包括《非政治化的政治：中國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政策，1927~1949年》。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GC 071 SC

ISBN 1-879771-61-6 (pbk)



9 || 781879 || 771611 ||

www.worldscientific.com

劉宏 黃堅立 主編

大視野 海外華人研究的 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主 編 劉 宏 黃堅立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02年4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61-6
版權所有 ©2002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編者的話

一年多前，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了《坦蕩人生 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劉宏主編)，本書為該文集的姐妹篇。前書較為側重王賡武教授作為“參與型”知識分子的生涯(包括他的成長與治學道路、對人生與社會問題的關懷，以及出掌香港大學校長的經歷等等)，本書所收的論文則較集中地展現了王教授作為“學院型”知識分子對國際學術界所做的貢獻。

衆所週知，王教授的學術涉獵甚廣。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83年曾評論道：“王賡武教授具有至少三個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Sinological Historian)，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Pundit)，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本書所收入的論文主要集中在第三個領域的延伸與擴展——海外華人研究。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作為這一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和導航人，王教授對該學科的發展及成熟起着重要的領導作用。從他於1955年出版的《南海貿易》一書(1998年再版)到2001年問世的四卷本文集之一的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他就不斷地從實證的和宏觀的角度闡釋了海外華人社群的多元性和

複雜性，並指出中國、當地社會以及全球歷史進程對華人群體的深刻影響。

本文集的論文大多為王教授近年來在不同的國際學術場合所做的主旨演講、基調報告以及專題評論。它們以宏觀視野為出發點，深入地分析了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理論、方法、資料等重要問題，並指出了該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作為深具全球觀點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還從跨區域的角度，論述了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的不同模式及其同中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相信，本書對讀者瞭解世紀之交海外華人研究的最新成就和發展前景有着很大的幫助。

本書的論文大多原以英文發表或撰寫，經翻譯後收入中、港、台、新等地出版的學術刊物或專著之中。雖然本書的編者之一曾參與了其中一些論文的審校工作，在收入本文集時，我們又比照原文將之進行了重新整理，並根據英文修訂稿增補了若干篇章的注釋。

作為本書的編者和部分論文的審譯者，我們十分感謝王賡武教授的充分信任。八方文化出版公司的唐文靜編輯的專業精神和效率使本書得以較快面世。最後，我們也要感謝中文論文的原出版者及譯者（在本書相關篇章中均有註明），尤其是韓方明博士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和張秀明主編的《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北京）等期刊。本書能夠順利出版，也是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的。

劉宏 黃堅立

2001年11月27日
新加坡國立大學

目錄

編者的話

v

理論和方法論：回顧與前瞻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3
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	32
海外華人研究的地位	60
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	78
再論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	97

民族主義：海內與海外

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119
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	136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復興	147
民族主義、族群性與亞太區域	173

區域和全球視野：海外華人與中國

中國革命與海外華人	203
大中華與海外華人	222

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地位：尋求盟友與伙伴	257
社會紐帶與自由：移民社會的選擇問題	276
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的發展	300
華人新移民：何以新？為何新？	325

研究課題與資料建設：從地方史到世俗主義

海外華人社會與地方史文獻	345
香港華人的過去和未來	354
同化、歸化與華僑史	368
關於文化中國的四個疑問	385
亞洲價值觀與世俗主義的前景	394

附錄：王賡武教授主要論著目錄	405
----------------------	-----

.....理論和方法論

回顧與前瞻

——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

我首先感謝里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建立這個研究海外華人的新中心。它源起於紀念我們難以忘懷的朋友詹尼弗·庫斯曼 (Jennifer Cushman) 的系列講座。這個系列講座幾年前由托尼·里德結集為《僑居者與定居者》出版。¹ 他不滿足於此，策劃建立這個中國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Centre)。他和他的同事確信向南方移居的華人這個課題是值得認真研究的，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恰是設置這種中心的理想場所。我同意這種看法。澳大利亞確實需要鼓勵這個領域的教學和研究，而且澳大利亞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良好條件。如今看到它已經起步，這是最令人欣喜的。我非常高興托尼邀請我發表開幕演講。我不需要更多地強調這是一個我想與其交往的中心。今天晚上我必須對為創建這個中心而努力的群體略表慶賀之情。

在座各位如今可能已經習慣對中國南方散居者這個詞耳熟能詳，因此也許會對我要在這裏就散居者一詞的用法發表反思感到奇怪。無論如何，我將王靈智與我最近合編的兩卷本論文集稱為《華人散居者》。² 我不得不對此進行某些內心的反省。長期以來，我始終主張海外華人應該被置於他們各自的國家背

景下進行研究，需要擺脫佔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心論。每個海外華人社群都需要面對比較研究，不僅與他們內部的社群比較，而且與其他移民社群比較。我們的兩卷本論文集強調定居——如“落地生根”³——一詞所反映——和六大洲社群間的差別，三十五篇論文強調了在世界不同地方找到新家的華人的多樣性。

我依然對使用散居者一詞有些不安，不是因為在英語中這個詞直到最近依然只用於猶太人（參見《牛津英語辭典》），不是因為這個詞指流離失所（希伯來語）或散居異鄉（希臘語）——它們都是關於僑居和移民現象的特定概念。⁴當然將東南亞華人與穆斯林世界的猶太人進行比較不僅誤導人，而且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但如果現實促成這種比較，就聽之任之吧。

我的保留意見來自華人由於華僑（sojourner）這個概念以及中國和敵對國政府從政治上利用這個詞而遇到的問題。從中國的觀點來看，華僑曾是一個關於單一的海外中國人群體的頗具力量的名稱。它被公開地用於造就國內和海外的所有中國人的族群的（如果不是民族的或種族的話）團結。在華人少數民族數量較多的國家，這個詞是懷疑華人少數民族永遠不會效忠於居住國的主要根源。經歷大約三十年的爭論，如今華僑一詞已經不再包括那些持外國護照的華人，逐漸取而代之的是其它詞，如（海外）華人和華裔，這些詞否認與中國的正式聯繫。我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是：散居者一詞是否會被用於復活單一的華人群體的思想，而令人記起舊的華僑一詞？這是否是那些贊同這個用詞的華人所蓄謀的？倘若這個詞廣泛地付諸使用，是否可能繼續將其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技術性用詞？它是否會獲得將實際改變我們關於各種海外華人社群性質的觀點的感情力量？

托尼·里德知道我的保留意見，他鼓勵我回顧並反思迄今爲止的海外華人研究歷史以及過去的方法對現階段研究的貢獻。這同樣給了我一個考察自己觀點的機會。我早期對海外華人歷史的興趣來自三個主要的學術源流。第一個是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他們賦予海外華人以單一的認同——華僑，即中國僑居者。這始自十九世紀末的滿清官員，接着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改革者和革命者及其日本支持者。⁵ 最後，李長傅、劉思慕、溫雄飛及上海暨南大學的群體開始研究這個課題，他們在1920年代建立第一個華僑研究的重要中心。隨着他們而來的是陳達、張禮千、許雲樵和姚楠，後面三人1940年在新加坡幫助建立了南洋學會。⁶

第二個源流是殖民地官員及其鼓勵和委任研究東南亞不同地區的華人的學者。這是由他們早期與各種華人的貿易經歷發展而來的。隨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擴張他們在東南亞和中國沿海的貿易利益，他們與這些中國人進行了交易。後來，荷蘭、英國和法國殖民地行政官員分別對他們特別關注的華人群體進行了研究。⁷ 他們既將中國人看作潛在的同盟者，又將其視爲對其統治的可能威脅。在二十世紀，維克多·巴素從1930年代開始嚴肅地撰述華僑華人，他在1951年出版的關於東南亞的綜合研究，成爲這個群體的最佳樣榜。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殖民地事務局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資助優秀的學者如莫里斯·弗雷德曼 (傅利曼) 和田汝康，他們的田野研究確立了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新標準。⁹

第三個源流是晚近的田野學者的著作。這些學者包括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他們原想研究中國，但在1949年共產黨

勝利使其不可能在中國從事研究後被迫轉向海外華人。這個流派的開先河者是研究泰國華人的比爾·史金納(施堅雅)，其他學者研究印度尼西亞、馬來亞、菲律賓以及柬埔寨各具特色的社群。¹⁰ 後兩個學者群的中國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弗雷德曼和史金納領導實施了著作豐富且意義重大的倫敦——康奈爾項目(London-Cornell project)，這個項目將香港和台灣作為非華人學者唯一能夠進入的華人社會進行研究。第二和第三個流派造就了新一代的學者，包括華裔東南亞人。¹¹

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所保留地採用強調海外華人認同的一致性的“華僑”一詞，而沒有人使用“散居者”一詞。莫里斯·弗雷德曼是《猶太人社會學學報》的編輯，最熟諳散居者的猶太人含義，他並不認為這個詞適用於華人。相反地，非華人學者熱衷於兩種各具特色的方法：首先是關於不同環境裏的各類華僑及其保持的中國特色的研究，其次是關於華人能夠同化並接受他們作為東南亞新的民族國家的公民地位的研究。¹²

我們知道本世紀早期華人被與歐洲猶太人進行了比較。¹³ 在納粹迫害和大屠殺後，晚近學者對直接運用比較方法裹足不前。第一個對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是海外華人研究者，而是印度尼西亞研究者。他就是已故的哈里·本達。他的家庭是捷克斯洛伐克大屠殺的犧牲者，他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生活多年，轉向研究印度尼西亞這個新國家。¹⁴ 1959年我們會面時，他指出東南亞華人的命運類似德國猶太人的命運，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就我所知，他在著述中盡量不使用散居者一詞。這可能是因為他確實認為每個華人社群都在形成它自己與眾不同的認同，這種認同與民族主義的中國學者和官員以及某些當

地社群領袖試圖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單一認同相異其趣。他知道1950年代東南亞新的政治條件迫使重新考慮在中國以外的民族主義對他們意味着什麼。

我原來並沒有打算研究海外華人。我的興趣始終是在中國歷史。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是作為一個中國僑居者——華僑而開始生活的。假如條件許可，這種人最終是要回歸中國的。我也不例外。我的父親來到這個地區，曾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馬六甲的高中教書，後來擔任我的出生地泗水的第一所華人高中的校長。他離開泗水後，成為霹靂州怡保華人學校的助理監督。怡保是華人居多數的城鎮，而馬來人則住在附近的郊區山村，多數印度人住在歐洲公司或政府官廳提供的住房。在華人中，堅打山谷的礦工多為客家人，城鎮的商家多為廣東人。此外還有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以及少數講其他方言的人。簡言之，這是一個英屬馬來當局統治下的多社群的城鎮，在馬來亞四個馬來人聯邦州中是頗為典型的。

我很早就意識到許多與我共同成長的華僑家庭將在某一天回到中國，其他家庭則處在矛盾之中。他們樂於住在中國之外，擁有相當安穩的生活，而且似乎滿意當地並不過多干涉他們生活的政府。然而，在我上英文學校所交的朋友中，我發現許多中國對他們幾乎沒有意義的人。他們的家庭完全適應了當地的生活方式，通常是說、讀、寫馬來語和英語，而不是華文。對他們和多數教師而言，我對中國事態及中華事物的關心是難於理解的。

對我而言，突出中國認同的事件是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日本的侵略隨着1937年全面入侵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此時，

多數華僑已經習慣於海外華僑居民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中國政治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已經波及到海外華僑中間。¹⁵ 它吸引華僑的興趣是因為世界各地反華的歧視性案件，惡毒的案件發生在美洲、澳洲和南非的移民國家。¹⁶ 總體而言，這類案件在東南亞較少傷害性，因為殖民地當局與歐洲移民國家的勞工階級相異其趣，他們發現華人對於他們的貿易和工業企業不無裨益。

華民族主義在學校和報刊中迅速傳播，這些學校是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華僑研究獲得中國的公開支持。通過家父及其教師和記者朋友，我知道了這類研究書刊，但沒有多少想法。確確實實的是某些人進行的號召海外華僑從日本的鐵蹄下挽救中國的宣傳。1937年後，成群結隊的人到處遊說，為中國的戰爭募捐金錢，奉勸所有華僑購買國貨，抵制日本的一切。¹⁷ 各方齊心努力，勸說海外華僑從單一華民族的角度思維，這種單一華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恰似單一和統一的華人散居者可能意味的。他們的成就包括募集龐大的捐款幫助戰爭和努力召募年輕的華僑和學生回國參戰。¹⁸

在日本佔領時期，華人認同意識在每個華裔身上滋長。這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因為他們被視為潛在的敵人。他們究竟是關注中國還是更忠於當地或殖民地政府是無關緊要的。這種背景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人只是將自己看作中國人。他們應該學習中國的語言，像中國人那樣生活，假予機會還應該回國服務，這是自然而然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準備在將來回中國，因此以與日俱增的興趣和責任跟我父親學習中文。¹⁹

這並沒有使我遠離各種朋友。在學習、遊玩以及鄰里中，特別是在戰爭結束後，我與馬來人、印度人、歐亞混血種以及不講中文的華人鄰居和同學渡過的時間超過了與想法像我一樣的華僑在一起的時間。與日俱增的作為馬來亞人的意識是我所理解和同情的，因為顯而易見，一個新的國家將在某一天從英國人捏合在一起的殖民地保護國脫穎而出。這個帝國行將結束。一種當地民族主義感情在我的朋友中滋長着。²⁰ 我願意與他們分享這種感情，但我還有更重要的責任。1947年，我進入父親在南京的母校。²¹

中國急劇的政治變化改變了我的生活。內戰即將推進到南京，大學關閉，這使我在1948年底回到怡保與父母團聚。²² 翌年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我進入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學習，回到了在學校所交的各種朋友的中間。他們多數在華人居少數的城鎮長大，接受英語教育。²³ 我很容易將他們等同於華人，儘管他們多數未曾像我一樣是華僑。對他們而言，他們是在祖國，規劃中的獨立的馬來亞國家充滿希望。對我而言，騷動的中國日益成為一個抽象的存在，它獻身於一種這個地區視為異端的意識形態。通過馬來亞流行的反殖民主義和英國式社會主義視角，我獲取了一種新的民族國家認同。這是從作為僑居者向自覺地決定定居在中國之外的第一步。我最終何去何從依然不得而知，但學做一個馬來亞聯邦的公民是一個開端。儘管如此，認知中國的責任感仍然保留了下來，這就是完成我已經開始的工作，理解這個古老文明可能出現的偏差及其依然具有的前途。在僑居和定居之間，我發現作為華人並不是障礙，而是支點。於是，轉向研究中國歷史看來是最自然不過的。